

乔姆斯基与福柯理论视域下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

李曙光*

[摘要] 语言障碍是自闭症最重要的并发表现,与社交障碍和沟通障碍紧密相关。在语言获得问题上,乔姆斯基认为儿童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以近乎统一的方式习得各自的母语,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大脑中就具备被称为“普遍语法”的初始状态,而这普遍语法则“人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因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该理论自然成为语言心理学领域的主流理论。尽管没有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但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人即便因语言模块遭受损伤不会说话,与动物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自闭症儿童不能当作异于人类的“他者”被排除。虽然与乔姆斯基不同,福柯不承认存在普遍的人性,但其对于疯癫史的考古学发掘告诫我们,自闭症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话语建构的结果,自闭症儿童不应该作为异于常人的“他者”被排除。虽然角度不同,但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分别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主张自闭症儿童应该享有与正常儿童一样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关键词] 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人性;他者

人的心理活动离不开语言,因此语言的获得、使用及保持等问题自然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就认识到需要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各自无法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在与心理学家的互动中,发动了语言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生成语言学理论,使语言学研究从收集并分析语言数据转向关注语言获得及使用的心理及神经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在与语言学家的合作中,完成了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的转向(李曙光,2011)。语言心理学(psychology of language)或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发展与壮大则是二者跨学科融合的一个力证(缪小春,2007)。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中,儿童如何获得语言是一个核心课题,乔姆斯基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对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的批判来构建其著名生成语言学理论的。

语言障碍是自闭症(autism)最重要的并发表现,与社交障碍和沟通障碍紧密相关。自闭症儿童人数近年来呈现猛烈增长的势头,所以语言心理学研究不应该忽略这一人数愈发庞大的群体。尽管乔姆斯基没有直接关注自闭症儿童的语言习得问题,但由于其理论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即便人因语言器官损伤而不能说话,其与动物之间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尽管在语言习得上存在巨大障碍,自闭症儿童仍然具备普遍的人性,不能被我们的理论及社会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10097。本文是“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20140901)研究成果。

生活排除在外。相较于乔姆斯基,法国学者福柯则一直将被主流学术话语忽略的边缘性人群(如精神病患者、同性恋以及罪犯等)作为自己的理论对象,为我们思考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障碍问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可以说,乔姆斯基关注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而福柯则更为关注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之间的异同,因此两位学者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连续体,二者互为补充,为我们认识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与空间。

一、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特征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的代表性疾病。美国精神病医生里奥·卡纳(Leo Kanner)1943年首次系统报道并描述11例儿童自闭症病案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人们对于自闭症病理机制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因此目前还没找到十分有效的治疗以及干预手段。然而,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自闭症诊断人数近年来出现迅猛的增长势头,例如,美国加州地区从2000到2005年间,自闭症儿童诊断人数就增长了16%(Liu, King & Bearman, 2010)。据估计,全球自闭症流行率平均大约为1%,其中美国1.47%,英国1.5%,日本1.8%,韩国2.6%,中国大陆0.75%(杨友,2015),因此自闭症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急需来自医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

由于语言障碍是自闭症最为重要的并发表现,大多数父母正是因自己的孩子语言发展严重迟缓或异常才开始关注孩子的发展问题的,所以描述自闭症儿童语言特征并探求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的心理机制自然成了自闭症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徐光兴,1999;Tager-Flusberg, Paul & Lord, 2005)按照语言指标,可以将自闭症儿童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类为有语言产出的自闭症儿童(verbal children with autism),另一类为无语言产出的自闭症儿童(nonverbal children with autism)。大多数自闭症儿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语言产出,没有语言产出的大概不足20%(Lord, Shulman & Dilavore, 2004)。

在发音方面,有语言产出的自闭症儿童一般能够像正常儿童那样发出需要习得的语言的语音,但Shriberg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发/l/、/r/以及/s/等语音时容易犯错误,而正常人群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在发这几个语音时存在困难;另外,相对于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在用以表达交际意图的韵律特征上(例如语用重音)存在明显缺陷,但在表示语法功能的韵律特征上差别不大。从总的趋势来看,自闭症儿童的语音习得模式跟正常发展儿童差别不大,发展模式基本相似,例如,某个音位(phoneme)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越低,犯错的几率就越高。(Tager-Flusberg, Paul & Lord, 2005)在词语习得方面,根据Tager-Flusberg等人(2005)的研究,自闭症儿童跟正常儿童一样能够使用以及理解属于同一范畴的词语,例如,他们也能够识别“鸟”、“船”、“食物”等都属于事物名称语义范畴,但与此同时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自闭症儿童几乎不使用“知道”、“想”、“记得”等表示心理状态的词语。其次,他们常常自己创制新词,例如,用commendment来表达commend(表扬)之意,用cuts and bluesers表达cuts and bruises(割破以及擦伤)之意。另外,自闭症儿童经常表现出“掉书袋”的倾向,喜欢使用生僻的书面词汇。在句法方面,Tager-Flusberg等人(1990)的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跟正常发展儿童的发展路径十分相似——在平均句长方面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曲线,但在句法结构丰富性上,与正常发展儿童相比,他们确实存在明显差距。在形态特征方面,英语自闭症儿童在动词时态的变化上表现出很大困难,例如,在本该说He walks或He walked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使用没有形态变化的形式He walk。汉语自闭症儿童也表现出类似的缺陷,例如,对于动词后面表示体态的“了”、“着”以及“过”等语素,他们在理解与使用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难(Zhou & Crain, et al., 2015)。

与正常发展儿童相比,自闭症儿童最为明显的语言特征之一是“鹦鹉学舌”般的回声式语言(echolalia)。回声语言指的是以同样的语调及措辞重复他人话语的语言现象。回声式语言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即时性回声,例如,自闭症儿童听到别人对他说“嗨,小刚”,他也跟着用同样的语调说“嗨,小刚”;另一种是延迟性回声语言,例如,一个自闭症小孩走近自己的父亲并且说“是呵你痒痒的时候了”,但是他说这句话是为了向自己的父亲表明,他想父亲给自己呵痒痒——而不是他想要呵父亲的痒痒。自闭症儿童这样“鹦鹉学舌”的原因是,此前听到过他父亲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在重复过去听到的话而已,但与即时性回声语不同的是,延迟性的回声语具有更为明显的交际功能。(Tager-Flusberg, Paul & Lord, 2005)自闭症儿童另外一个明显的语言特征是代词的逆转使用。具体表现为,常常用“你”来称呼自己,而用“我”来称呼交谈对象。这表明自闭症儿童在交流时存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对话角色转换的困难,在对自己和他人的概念进行概念化的加工过程中存在问题。因此,代词的逆转使用常被作为自闭症儿童的一个重要诊断指标。(李晓燕、周兢,2006)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代词的逆转使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好转。(Tager-Flusberg, Paul & Lord, 2005)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自闭症儿童在发音、词汇及句法等方面与智力水平相当的正常儿童相比,在发展模式方面总体上还是比较相似的,二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语言使用上。无论是他们偏好自创新词,使用回声式语言,还是不能正确使用人称代词,均从不同维度表明自闭症儿童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明显的障碍(李晓燕、周兢,2006)。

二、乔姆斯基理论视域下的自闭症儿童

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这一问题,虽然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无论非洲丛林里的部落成员还是关注人性的哲学家,谁都无法否认具有语言、会说话是人的一个重要本质属性。例如,在非洲某些部落里,新生儿被称为kuntu(东西),只有在新生儿逐渐长大、开口说话之后才被称为muntu(人)。(Fromkin & Rodman, 1993, p.3)二十世纪著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2005,第36—37页)则认为,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由于语言是最为重要的符号形式,因此“语言常常被看成是等同于理性的,甚或就等同于理性的源泉。”

在语言心理学领域,旗帜鲜明地将语言视为人性的核心特征当首推乔姆斯基,他不仅认为语言是“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最基本的能力”(Chomsky, 2016),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生成语言学理论。也就是说,将语言看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并认为任何人(不分种族、民族、职业、年龄、性别等)具有同样的底层语言能力,即被他称作专属人类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UG)。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语法在乔姆斯基语言心理学理论中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从生物学视角来看,普遍语法指的是人脑语言模块的初始状态,即新生儿大脑所具有的那种状态,随着儿童的生长发育,逐渐习得自己的母语,这种初始状态会发展成一种稳定的成熟状态,该状态会因所习得语言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参数差异。从语言研究角度来看,这是人类由于基因遗传决定,新生儿的大脑所具有的这种状态使其具备了成功习得母语的可能,并且当其达到成熟的稳定状态之后,儿童就能够说出合乎其所在社团语言规范的句子。在生成语言学中,这种初始状态以及其后的稳定状态都被称为语法。所不同的是,初始状态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从而称为普遍语法,而成熟的稳定状态会因习得的具体语言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从而称为特殊语法(particular grammar, PG),或者简称语法。用乔姆斯基的话来说,“成熟的稳定状态将母语为日语的说话者与母语为英语的说话者区别开来,而初始状态则是将人与石头、鸟儿或者黑猩猩区别开来”(Chomsky, 1980)。由于说话者大脑具有了特定的状态,或者说具有了特定的语法,他就具有了使用某种语言的能力或者说拥有了关于该语言的知识,所

以在生成语言学文献中,上述意义的语法也被称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或者语言知识(knowledge);也就是说,在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理论中,“语法”、“语言知识”以及“语言能力”具有相同的所指。(Chomsky, 1980)在生成语言学看来,人类语言最为核心的特征或者说语法最为本质的属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人类大脑中所存在的一套有限程序(finitely-specified procedure),这套程序可以生成数量上无限的离散表达式,并且这些表达式具有内部层级结构。(Chomsky, 2016)由此可见,语法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数学特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函数,该函数可以将一个有限集合投射成一个无限集合。对于一个习得了某个语言的母语者而言(即他大脑中的语言模块已经发展为稳定状态),语法的作用就是将其心理词库(一个有限集合)投射到一个无限句子的集合,因为一个人能够说出的句子数量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对于一个拥有初始状态——即普遍语法的呀呀学语的婴儿来说,普遍语法也发挥了同样的函数功能,所不同的是,作为函数的普遍语法是将学语的婴儿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语言输入集合,投射成一个有限的语法集合,即所有人类语言的语法集合,在目前来看这个集合的成员是有限的。诚然,考虑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说话者实际说出的话语应该是一个有限集合,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成语言学所关注的是语法的生成能力,是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理解,就可以看成是内涵性的(intensional),而不是外延性的(extensional)。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乔姆斯基在文献中又将上述语法、语言知识以及语言能力称为I-语言(I-language)。当然,这里的字母“I”除了包含intensional这个层面以外,还包含了生成语言学特有语言观的另外两个方面,即语言是说话者个体大脑中语言器官的一种状态,从而是“个人的”(individual)以及“内部的”(internal)。(Chomsky, 2016)乔姆斯基的上述语言观,与将语言看成是社会的以及实际上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书面语篇)这种语言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这个原因,乔姆斯基语言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理论。

尽管乔姆斯基上述理论是基于正常儿童语言习得的事实提出的,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的特殊儿童语言发展问题没有得到其系统的关注,但在乔姆斯基本人的著作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于先天以及后天遭受严重语言损伤人群的语言发展以及使用问题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思考。上世纪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如果给失语症病人以充分的训练,他们就能够很好地使用视觉符号来进行交际,用这套符号系统来训练大猩猩时,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由此他们认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遭受严重语言损伤的人,在交际行为的习得上与高等猿类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乔姆斯基针对这种模糊人类与动物之间界限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认为这种观点与以下这种荒唐的说法一样不值一驳:当鸟儿的翅膀被剪掉,它就只能跟人一样,只能笨拙地“扑腾”几下,从而飞行能力遭受损伤的鸟儿跟人类在飞行方面就没有什么区别了。(Chomsky, 1980)由此可以看出,乔姆斯基认为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的具有语言障碍的人群,尽管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习得或者使用语言,但是他们跟动物之间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因为作为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的乔姆斯基相信“每个人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思想和天赋的结构,有协调自己生活的潜力,因而有能力过上正直的、有创造力的生活”(厄尔德斯, 2012)。实际上,从我们以上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特征的描述来看,自闭症儿童在先天语言能力以及语言发展上与正常儿童之间似乎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也印证了乔姆斯基观点的合理性。自闭症儿童之所以存在语言障碍,从目前的研究发现来看,主要在于其社会交往以及语用能力,因此从社会而非生理或者生物的角度来看待自闭症儿童,对其进行有效的语言干预以及教育培训,似乎是当前应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福柯理论视域下的自闭症儿童

尽管乔姆斯基在主观上承认了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一样,具有人类天赋的普遍“人性”,但不可

否认乔姆斯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理论从根本上讲,还是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追求科学、理论以及理论的可证伪性,因此客观上不自觉地强化了语言心理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问题时,把儿童分为正常的和特殊的,并仅仅将正常儿童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有关人性以及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二元划分上,福柯的话语理论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我们超越纯粹的生物视角看待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在是否存在普遍人性问题上,福柯与乔姆斯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如上所述,对于乔姆斯基而言,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他始终坚信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存在一种相对确定的人性,那么对人进行真正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基于对儿童习得母语的观察,乔姆斯基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在一些不全面、碎片化的经验基础之上,每个文化中的个体如何不仅能够学会自己的语言而且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所习得的语言?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只存在一个可能的答案——在人们的心智背后存在着一个生物—物质结构,正是这一结构使得我们(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种群)能够从各自多种多样的个体经验中推导出一个统一的语言。乔姆斯基坚持认为,必定存在一套图式、先天的原则,“这种图式、天赋组合原则的聚合,这庞大的体系指导着我们的社会行为、智力行为以及个体行为,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的概念。”(乔姆斯基、福柯,2012,第15页)可以说,乔姆斯基的学术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努力揭示这些图式和原则。他的目标就是,提出一个可检验的数学理论来描写及解释心智,并且他继承的传统是笛卡尔理性主义。

然而,福柯不赞成乔姆斯基关于人性和科学的观点。在方法论问题上,福柯一如既往地回避抽象的问题——人性是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人性的概念如何发挥其作用?福柯以十八世纪的生命科学为例,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学科之内实际存在的可操作的范畴与那些宽泛的标签(marker)如“生命”、“人性”清楚地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这些宽泛的标签对于一个学科的内部变化不怎么重要。他认为,语言学家不是通过研究人性而发现辅音变化规律的,弗洛伊德也不是通过研究人性而发现用于分析睡梦的原则的,文化人类学家同样也不是通过研究人性而发现神话结构的。在知识史上,人性这个概念对于他而言,只能起到指称那些关涉或者反对神学或者生物学或者历史学的话语类型的作用。因此,人性这个概念很难被看作科学的概念。(乔姆斯基、福柯,2012,第17页)福柯对普遍真理的断言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他虽然没有对其进行正面反驳,但却坚持将这些宏大的抽象概念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在乔姆斯基与福柯的电视辩论中,虽然福柯对于是否存在人性这一点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却把主题转换到人性这个概念的社会功能上去,讨论人性在诸如经济学、技术、政治以及社会学等社会实践语境中发挥的作用。(Rabinow,1984)

其次,福柯认为所谓的科学理论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规训的结果,是一种权力话语,其真理性高度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按照福柯的理论,乔姆斯基所主张的以普遍语法为核心的普遍人性论也只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福柯对于抽象的普遍人性进行质疑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于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疯子、罪犯以及同性恋等。福柯正是在对这些人群众体在人类思想史中地位变迁的讨论当中,来思考人的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等问题,试图跳出困扰西方哲学始终陷于“我在”与“我思”二元对立的“轮回颠倒”(叶秀山,1990),把科学知识看成话语实践的过程与产品,用考古学的眼光来分析这些话语实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受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福柯的学术生涯从关注精神病问题入手,并且以《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作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部著作的一个主要核心思想就是,疯狂并非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种精神疾病,而是各种各样的因时而异的意义。例如,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疯狂是因某种天启而形成的,从而疯子被视为特殊的获救者,具有常人所不及的智慧与语言能力。在古典的理性时代,由于认为理性即人性,从而疯狂具备了不同的意义——疯狂被视为与理性的对立面,人们因此对疯子产生恐惧并试图隔

离或放逐他们。在欧洲，一度借用控制瘟疫的麻风病所来关押隔离大批疯子，或者把他们当作野兽般的怪物驱赶或示众。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对疯狂的认识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型，疯狂开始被视为一种心理疾病，从而诞生了精神病院，精神病医生从此被赋予鉴定与治疗疯子的特权，他们同时也自以为拥有裁判疯人语言意义的能力。（赵一凡，1994）由此可见，同样是疯子，在不同时代却被分别视为“拥有神启的特殊获救者”，“具有兽性的他者”以及“需要治疗的病人”。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在福柯看来，不是人们对“疯人”的知识加深了、完善了，“而是由知识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组织、制度的因素决定的”。（叶秀山，1990）福柯对于精神病认知史的考古学式发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精神病的历史并不是理性引导下、病理分析从蒙昧到明晰的连续进步史，而是更为复杂的断裂流变史，病理学的精神病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权力话语实践的结果，是人为的产物。在现代，精神病之所以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与罪犯被看成是可以改造的对象是一致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生产性权利制度中，重视身体的经济价值，致使各种规训用“温和一生产一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一暴力”原则。（郑鹏，2015）

实际上，人们对于自闭症的认识大体符合福柯对于疯癫的考古学式考察。首先，人们对于自闭症的认识与福柯对于疯癫的考察表现出类似的历史流变。一开始，自闭症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分裂症，从而大量儿童被作为异于常人的他者被排除。虽然当下人们对自闭症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认为自闭症是一种可以矫正的发展障碍，但这种排除性对待的后果却一直存在：“尽管已经是一个可以诊断的病症，但是自闭症在公众心目中还不具有真实的存在；很多自闭症儿童仍然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或者仍在遭受‘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诋毁”，在英国自闭儿童在教育权益方面一开始根本没有保障。”（Murray，2008，p.xvii）其次，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闭症（更准确地说自闭症这个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构建的”（Nadesan，2005，p.2），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闭症儿童的诊断条件与其说取决于其生物条件，还不如说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经济与文化实际。例如，十九世纪用以识别障碍行为的标准相当粗略，而作为评价正常行为的标准则相当宽泛。另外，十九世纪之前，儿童不会被强制接受任何形式的“发展”或者心理检查，除非他们的状况相当严重，并且他们的父母经济条件要相当好，因此只有富裕家庭才有能力知道儿童患有精神疾病。（Feinstein，2010，p.5）再次，自闭症这个概念是话语实践的结果。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对于人以及外部世界的认知其本身是话语实践，我们的科学知识不仅由话语来表征而且是话语实践的产品。由此观之，诸如《美国精神病诊断分类统计手册》这样的自闭症诊断手册就是一个处于特定社会实践以及制度矩阵中的话语，该话语的传播与流变对自闭症儿童的存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Liu, King & Bearman（2010）通过七次调查发现，自闭症的诊断率在2000到2005年猛增16%的主要原因是自闭症信息的有效传播，生活在已经确诊的自闭症儿童附近的儿童相对于其他儿童而言，诊断为自闭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以至于在美国，每小时就有一个孩子诊断为自闭症。此外，很多研究者认为1980年后《手册》所代表的诊断标准不断修订是自闭症患病率大幅升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邹小兵，2013）

四、结语

由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语言交流具有明显的障碍，因此语言习得与运用问题自然是自闭症儿童发展研究重点关注的课题。在儿童语言习得问题上，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理论是基于正常发展儿童而建立的，因此将自闭症儿童放入其理论框架中进行检视非常必要：一来，可以获得一个参照体系，用以深入认识与理解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特征；二来，可以考察该理论是否具备其所欲求的充分性。虽然乔姆斯基没有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作为其直接考察对象，但其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人即便因语言模块损伤不会说话，与动物之间仍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一个自然的推论就

是——自闭症儿童仍然具备人类独有的人性。由于乔姆斯基的普遍人性是从生物学角度来构建的,因此他实际上只是反对从生物学角度将自闭症儿童作为异于常人的“他者”而排除。与乔姆斯基相对,福柯将包含自闭症儿童在内的大量社会边缘人群作为自己直接的理论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人类对于这些“他者”的理论认知。福柯的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对于自闭症儿童等人群的认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理性的结果,其实质上只是受制于社会、经济以及权力矩阵中话语实践的结果。不同时代的认知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断裂性,并没有表现出一般所认为的那种进步性与连续性。迷信于人类理性的一个负面的后果就是——按照“排除原则”将人类自身进行整理、归类,从而将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的所谓边缘性人群作为社会性“他者”而排除。福柯甚至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一开篇,就引用帕斯卡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对人类的这种自负提出警告。这两段警世引语分别是:“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一形式的疯癫”;“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福柯,2012,第1页)。乔姆斯基与福柯虽然在有关“人性”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自闭症儿童问题上,一方面,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反对将他们作为异于常人的“他者”而排除。另一方面,二者对于我们的启示却有所不同的: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具备同一的人性,要求我们承认与保障自闭症儿童应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福柯的理论则提醒我们,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各类诊疗及干预时,一定不要过于“自负”,要对基于理性的话语霸权所具有的排斥性功能保持警惕,从而确保自闭症儿童能够得到自闭症研究之父里奥·卡纳所提出的三个A——affection(爱)、acceptance(接纳)以及approval(肯定),因为在卡纳看来“如果一个儿童拥有这些,不管他的智力水平或者其他方面如何,他都会是正常的。”(Feinstein, 2010, p.10)

参考文献:

- [荷]方斯·厄尔德斯,2012:《诺阿姆·乔姆斯基和米歇尔·福柯:范式的冲突》,载方斯·厄尔德斯编:《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桂林:漓江出版社,第1—7页。
- [法]米歇尔·福柯,2012:《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 [德]恩斯特·卡西尔,2005:《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德]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2007:《福柯的迷宫》,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曙光,2011:《乔姆斯基语言心理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李晓燕、周兢,2006:《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综述》,《中国特殊教育》第12期。
- 缪小春,2007:《译者前言》,《语言心理学》,D. W. 卡罗尔著,缪小春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美]诺阿姆·乔姆斯基、[法]米歇尔·福柯,2012:《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方斯·厄尔德斯编,刘玉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 徐光兴,1999:《自闭症儿童认知发展与语言获得理论研究综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
- 杨友,2015:《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对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治的影响》,《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12期。
- 叶秀山,1990:《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赵一凡,1994:《哈佛读书札记·福柯的话语理论》,《读书》第5期。
- 郑鹏,2015:《疯狂史研究对福柯的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邹小兵,2013:《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手册第5版‘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标准’解读》,《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第8期。
- Chomsky, N., 1980, “Human language and other semiotic systems”, in T. A. Sebeok & J. Umiker-Sebeok (eds.), *Speaking of Apes: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Man*, New York & London: Plenum Press, pp.429—440.

- Chomsky, N., 2016, “Minimal computa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vol.12 (1), pp.13—24.
- Feinstein, A., 2010, *A History of Autism: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ioneer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Fromkin, V. & R. Rodman,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 Liu, K., M. King & P. S. Bearman, 2010,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autism epidemic”, *AJS*, vol.115, no.5, pp.1387—1434.
- Lord, C., C. Shulman & P. Dilavore, 2004, “Regression and word loss in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vol.45, pp.936—955.
- Murray, S., 2008, *Representing Autism: Culture, Narrative, Fascinati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Nadesan, M. H., 2005, *Constructing Autism: Unraveling the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New York: Routledge.
- Rabinow, P., 1984, “Introduction”,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p.3—29.
- Shriberg, L. & R. Paul, et al., 2001, “Speech and prosody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high-functioning autism and Asperger syndrome”,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vol.44, pp.1097—1115.
- Tager-Flusberg, H. & S. Calkins, et al., 1990,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utistic and Down syndrome children”,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vol.20, pp.1—21.
- Tager-Flusberg, H., R. Paul & C. Lord, 2005,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n autism”, in F. R. Volkmar, R. Paul, A. Klin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Autism and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 Sons, Inc., pp.335—364.
- Zhou, P. & S. Crain, et al., 2015, “The use of grammatical morphemes by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vol.45, pp.1428—1436.

(责任编辑:蒋永华)

Language Disord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omsky and Foucault’s Theories

LI Shu-guang

Abstract: Autism is characterized by language disorder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deficiency in social skill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cern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Chomsky argues that the reason why children can acquire their mother tongue rapidly with great uniformity is that they are born with the same initial state of human brain, which is termed universal grammar in his theory. The universal grammar is the essential part of human nature. Because of its strong explanatory adequacy, Chomsky’s theory has natur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in psychology of language. Though failing to take children with autism as his theoretical object, Chomsky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differ from animals in nature even though they cannot speak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ir language organ. Therefore, a natural inference is that children with autism cannot be segregated as “others” bi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children. Differing from Chomsky, Foucault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iversal human nature. His arche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adness, however, reveals that autism is just a notion constructed by power/discourse and thus children with autism cannot be banished as “others” social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children. Thoug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two great theorists both insis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at children with autism enjoy the same right to life and development as normal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 with autism; language disorder; human nature; others